

却顾所来径

1925—1952 年清华大学
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 (上)

清华大学中文系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却顾所来径

1925—1952 年清华大学
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

(上)

清华大学中文系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而编选的集子,收录 1925—1952 年间任教于中文系的 62 位先生的文章,编选原则是着力发掘不够知名的学者们应被重读的著作,以及知名学者尚不甚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梳理系史、缅怀前辈的同时,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史拾遗补缺。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却顾所来径——1925—1952 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 / 清华大学中文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302-24846-0

I. ①却… II. ①清…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3147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40 印 张:53.75 字 数:864 千字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00

定 价:120.00 元 (全两册)

产品编号:041119-01

目 录

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	汪鸾翔	1
校史随笔序	傅增湘	7
宋代诗学	黄 节	10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	19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须了解中国文字	马叙伦	30
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	杨树达	47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	钱基博	60
中国字形变迁新论	钱玄同	69
“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沈兼士	77
淮南子逸文	刘文典	89
新文学的将来	杨振声	95
四声三问	陈寅恪	101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赵元任	111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	郭绍虞	145
印度文学	许地山	160
西藏文语法译者序	张 煦	172
大学教育的问题	孟宪承	181
诗学总论	吴 宓	197
秦始皇刻石考	容 庚	210
《文选》篇题考误	刘盼遂	246
论戏剧批评	余上沅	259
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	朱光潜	266
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	郑振铎	275
论“以文为诗”	朱自清	286

离骚解诂	闻一多	292
左拉的《萌芽》	杨 晦	304
《通志·七音略》研究——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	罗常培	310
飨礼考	许维适	325
后四十回底批评	俞平伯	354
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	罗根泽	370
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	王 力	381
宜戾矢毁考释	唐 兰	409
古代彝器伪字研究	商承祚	414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	吕叔湘	430
花蕊夫人宫词考证	浦江清	442
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	赵万里	484
七言诗起源新论	余冠英	491
谈文艺批评	李广田	507
谈《阿 Q 正传》	吴组缃	510
鲁迅《秋夜》读记	毕奂午	520
《庄子·逍遥游》解歧	何善周	525
论秧歌剧的形式	艾 青	546
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	李嘉言	555
卜雨之辞	陈梦家	571
汉语句终词的研究	高名凯	578
讲史与咏史诗	张政烺	607
“文”义探原	季镇淮	652
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	王 瑶	665
《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	吴晓铃	684
《成相辞》与《击壤歌》	赵仲邑	705
上古汉语的 SOV 语序及定语后置	张清常	709
从“讽喻”到“闲适”——旧时代诗人的道路	叶兢耕	718
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	范 宁	724
论杜诗的用字	冯钟芸	729

论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辞	马汉麟	743
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	朱德熙	750
《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	高熙曾	767
国文科目说明书	戴元龄	771
周易卦名释义	林义光	775
《史记》决疑	李奎耀	786
赋中之别体	王宾阳	813
论言语	郭良夫	825
附录：1925—1952 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职员名录		833
后 记		841

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

汪鸾翔*

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很多很多,然而甚不愿轻易的写他出来。这是什么原故咧?因为我的这种意见,是很有经验的,是很有价值的。若是轻易的写了出来,被一班无识的人七嘴八舌,胡乱去评论一番,我若不与他辩论咧,我的意见就能显明;我若与他去辩论咧,必定费纸费笔,而且耽误光阴。所以我不如姑学那仗马寒蝉,装一个哑子便是了。借此可以省去多少麻烦。今既承周刊社员之问,定要我说,所以我将我的意见略说一点,这是各人发表各人的思想,大约是无甚妨碍的。我要发表我的这个意见,须先将我对于国文上经过的境遇,先略说明。我对于国文上的境遇,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究竟是那四个咧?第一时期,就是热心科举的时代。这时期就是光绪十年至十四年之间,就是我十一岁至十五岁的光景。这个时期,对于国文上之勇猛,是诸君想不到的。彼时不但四书五经全要背诵,就连朱子的注解,也都全要背咧。一个幼弱的脑筋,要容纳许多的古物,也算是力小任重的了。那时不但读书切实,而且所作的文章也与现在不同。有叫什么八股文的,有叫什么试帖诗的,有叫什么古赋、合律赋的。八股文中,又有小题、大题、单句题、截上题、截下题、截搭题,种种的分别。既要作些等文字,必须多读此等文字之书以为模范。所以于当日最时兴的什么《八铭塾钞》呀,《韞山文稿》、《棲山文稿》呀,《小题正鹄》呀,《赋学正鹄》呀,《试帖七家诗》呀,也得横七竖八的,装上他一肚子。若到考试的时期,每试就是三场或五场,每场就是三篇或五篇。八股试帖之外,还要作什么经文与策论。如今以上所说各种读本,坊间是不经见的了。以上所说的各种考试,国内是不再行的了。然而当日十余龄的童子,竟要身当其冲,你说是不是一件苦事咧。

* 汪鸾翔,字巩庵、公岩,广西桂林人。就学于广雅书院,为朱一新弟子,光绪举人,曾入张之洞幕府。1926—1927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除清华外,曾任教于法政学堂、北京高等师范、河北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国立美术学院,195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汪鸾翔是近代名士,精通中国文学、绘画,还做过动植物学方面的研究。他是清华大学中文校歌的词作者。

第二时期，就是负笈游学的时代。我于国文既尝上说种种之苦，回头一想，这事有点不对。天生我辈，就是专尝这种痛苦的么？这种痛苦，就算是吾生的知识学问么？天下事业，就没有更大于此的么？辗转思量，非负笈从师不可。但是天下滔滔，负笈往那方走才好咧？恰巧那个时节，两广的总督在广东地方起了一座“广雅书院”，出示招生投考。我一听见这个消息，喜得眉飞色舞。一来此地去我家甚近，不过一水之便；二来藉此游历，添点历史地理上的知识。我就连夜赶紧报名，把寄来的题目，满皆作上。足足写了一大本，如法寄去。试官一看欢喜，把我高高的取上，从此我就撇入这个书院肄业。入院之后，才知八股以外，尚有许多学问。把我从前的言论思想一切改变，居然是换了一个人了。我在这个院中，其乐非常，仿佛哥伦布寻得美洲新地一样，种种物产是取用不竭的了。此院章程，分经史理文为四大课，还有什么时务，也算一门。但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不过看他作附属品、随意科罢了。我在这院住了数年，所有平生的学问知识，皆是从这院里来的。直待后来中了乡试，必须进京会试，不得已才离了这院。我进京后，依然在京留学，功名之事殊不挂眼。此时得接交海内有名的人物不少，我的志趣就更如坚定了。但思想仍系倾于旧的方面，且因得见古碑古书等物甚多，好古的心因之更笃。至于新学各种，虽亦偶然涉猎，然不过视为课外的事罢了，心中是不甚注重的。

第三时期，就是厌弃旧学的时代。据上所说，我乃完全是一个旧人，怎么会有厌弃旧学的时代咧？这事说来也大奇哪。我在京师，一住数年，年纪已二十余岁了。当光绪二十年甲午，那时中国不是与日本打仗吗？那时我正在北京方家胡同国子监内读书咧。是年方做万寿，忽然战事发生，中国出兵的腐败情形，与那日本的藉势欺侮情形，是我所目击亲见的。彼时主战的就是军机大臣翁同和，主和的就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战的固不察敌情，主和的竟以儒为戏。同时更有许多不明世界大势的人，也不必说了。我看国事糟到这步地位，大都由于文人不讲新学的缘故。日本知方有勇，我国如此糟拉。如此时局，尚复读书何用？不免废书而叹，大有投笔从戎之概。但使于国家有丝毫的补助，就是粉身碎骨，也情原的。一把毛锥子，尚留他何用呵？当日士大夫的议论，分西学为三部。（一）曰西艺；（二）曰西教；（三）曰西政。又说什么西政、西教是年长的人所当研究的。至于西艺，非年轻的人去学，是没不成的。我那时仗着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遂没然以西艺自任。将翻译的西书，买了个盈箱满篋，伏首钻研不息。一时兴之所

至，竟要将中国的古书束之高阁。甚至想学秦始皇的故事，拿一把火来焚了才好呀。有时矫枉过直，见了宽袍大袖的人，就说他是腐败废物；见了洋衣洋冠的人，就称他是英雄豪杰。说来倒也奇怪。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话是一点不错的。我既羡慕西学，久而久之，不但将我所住的仿佛似古物陈列所的旧书房，竟焕然一新，变了仿佛似标本仪器室的新气象了。不但亲友之中，人人以新学家相称许。连自己也就自忘其陋，俨然以西方的兑飞(Dufay)、培根(Bacon)、达尔文(Darwin)、赫肯黎(Huxley)自命。但是我在自己家中研究科学，不过为自己求增知识起见，并无一点沽名钓誉的心。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不由自主的。当日风气初开，人才缺乏，竟有人羡慕我的行为，从老远打电报来请我去当他们学堂里面的教习的。你看此事从那里说起，岂不是一段佳人奇遇吗？我因为欲传布我的宗旨，遂亦慨然承认不辞。然而我的一身投入教育界中，遂从此始。此生与教鞭有缘，亦自此开了端。光阴易过，日月如梭，劳劳于粉笔黑板之间，汲汲于科学讲义之内，屈指一算，竟忽忽的已经过了十余年了。

第四时期，就是还读我书的时代。我讲我的科学，本来是很有味的，社会上也从来未有反对我的。然而我为何又要讲回我的国文来咧？此事诸君有所不知。凡人生在世间，不过数十寒暑，作事须作一点有价值的事。苏格拉底说的“科学是不生产的”。故非从事哲学，思想不能高尚。况且投身教育的人，如医家的治病。人有寒病的时，须用热药；人有热病的时，须用凉药。今日风气大开，研究科学的人不少，何必添上我一个咧。回看本国文字的学，反在存亡危急之状，若不亟加讲求，恐将陷于朴鄙不文的现象。且科学程度有定，青年多优为之；国文途径分歧，非胸有成竹的不能董理。且文字是变化人精神上的事，比科学偏之于物质方面，作用稍微大些。此乃我情愿牺牲其研究科学的光阴，改而为讲究国文的缘故。况且研究国文之暇，仍可以研究科学，两事是并不相妨碍的咧。

以上我将我对于国文的境遇说了一遍。诸君或者以为此不过关于我一个人的事，且皆是闲话，并不见发表有何种意见。其实不能。我说这篇话的意思，共有三样意味：(一)须知人生的思想，是时时变的。即如我的一生，已有四样思想。诸君现在的思想，未必一定不移，将来也是或有变的。(二)须知我的改良国文意见，是有科学知识的说话，不是片面说的。有此信心，然后乃能尊重我的意见，不是老生常谈的意见。(三)须知我说的意见，是从新旧各科学中研究过了，然后发生出来的。是可实行的，不是理想的。明此三条，然后可我说的意见。我的意

见，究竟是什么咧？就是今日的文学，须是与科学不相背驰的文学便了。不过我们从前得这个文学知识的时候，是从千辛万苦而来的，今日是请诸君一跃而至的。譬如由西直门到清华园，我们是请诸君由汽车而到，不但时间省却，而且也觉得快乐多了。并且有许多不必走的路，也就可不走了。此是我改良国文意见的大纲。至如细目请再言之如下。

（一）白话文不访问作。白话文是我国古来已有的，最古的算为《论语》。后无如佛家的语录、宋朱子的《语类》、明吕新吾的《呻吟语》等，皆是白话文的种类。元朝以后，用白话著为小说的尤多。如《水浒传》等等皆是。后人以其言不雅驯，遂忽略视之。近人觉其可为通俗的用，重新提倡。美其名曰新文学，其实仍是旧文学罢了。但只可认为国文中的一部，不可认为国文中的全体。譬如车驴夫休息所，没不可认为大礼堂。白话文三字太不雅，似宜改称语体文较佳。这语体文三字，便是由语录语类的意思变化出来的。

（二）诗歌必须兼读。古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为文必知韵语，乃得文章的全体，否则谓之通笔而已，不能谓之通文。今人忽视此事，故笔通而文不通的甚多。不知此层不讲究，于文学上障碍殊多。即挂一副对联，亦不知孰上孰下。甚有已得学士博士，不知平仄为何物的。然此等事昔人多是童而习之了，尚岂今人的智识，反在古时妇人孺子下吗？不过习与不习罢了。故我以为欲通国文，此亦一件要事。此事不通，而谓国文能全通的，恐无其事。譬如起屋，少了几根梁柱，而望屋的完成，恐怕是不能的。今日我讲此话，或者笑为多事。他日必有思吾言的，其为期想亦不甚远咧。

（三）小说宜加选择。小说为古学术之一家，后世列为子部中之一种。故小说是否为文字中之一体，尚是一种问题。近人以其有助文学，遂附入文字中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事亦非绝不可行。惟吾人光阴宝贵，此等书汗牛充栋，只可择其有意识者读之。一切无用谰言，吾辈岂可光阴虚糜？至于《西厢记》与《石头记》二书，吾人为研究文学起见，以余力偶一涉猎，亦未尝不可，但不必列为正课。固吾人应读的书不一，比他远重要的尚复不知凡几。若终日埋头于此，更将何时间读比他更要的书咧。且《西厢》有南北两本，与之匹者尚有《牡丹亭》一书。若非于韵文稍有根柢的人，读之亦难得其妙处。《石头记》则其中隐事甚多，解明者亦不一家。若中空无物者读之，宁复知为何？语所指何事？非此等书的不善，乃读此等书的人，甚不易求。或者列诸高等科文学中研究，尚不为迟。

故吾谓小说之宜选择者以此是量体裁衣的意思，诸君莫误认为俗儒迂腐之谈呀。

(四) 高等之阅书宜改为选科。本校高等科向有阅书一门。用意本来甚好，无奈积久弊生。多有视为具文，或漫为无系统的研究。故愚意宜改为选科，即无此弊。至选科之系统，约分三种。其研究哲学的，归哲学系统；其研究史学的，归史学系统；其研究文学的，归文学系统。惟文学为事甚少，宜改兼史学或哲学一门。凡选科由教员指授大意，自行研究，作为劄记，呈请教员改正之。虽仍是阅书的性质，然比阅书有系统得多了呀。

(五) 经学必不可少。居今日而言经学，莫不笑为迂谈。以经学而殿于各科，更无不咤为奇事。不知此事，并不足奇。且系绝不可少，究竟是何缘故咧？大抵中国文字，不外子史两门。凡说理的便是子，凡记事的便是史。所谓经者，不过将最好最古的子合史，挑选几种出来，放在一旁，更别加以总名，尊之曰经。所谓经之来源，不过如是而已。今略为证明吾说。如《易》是近乎子的，《尚书》、《春秋》是近乎史的，《诗》则子略兼史，实为后世集部的滥觞。质而言之，经者即最古之子与最古之史，兼最古之集罢了，平淡得很。今人于后世的子、后世的史、后世的集，尚殷勤读之；于古圣人挑出来的子史集，反弃而不读，岂不大可怪吗？故吾以为列经学为最后之学科，使知子史集的本源，乃是最要紧的。不过进读数种最古之子史集，比平常稍难一点罢了。又有什么了不得咧？或者以为经文乏味，故学者不肯用功，其实不然。我实告诸君，诸君如肯细读经书，其中文字的美貌，比看《西厢》好得多咧。今但举诗经为证。其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个字，就活活的把一个美人姿态画了出来。比那《西厢记》所说的“檀口点樱桃，粉鼻倚琼瑶”十个字，岂不更活泼吗？更有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等句，则更比《西厢》强得多了？今人但看《西厢记》所形容的俗美人，而不看《毛诗》上所形容的古美人，这可谓不美看美人了。然则我们把《毛诗》拿来当一部最古的《西厢记》读，又有何难懂且乏味咧？再以记事之文言之。《禹贡》一篇，寥寥数页，把九州的山脉水道、土宜物产，记得清清楚楚，明白无遗。试问《红楼梦》中，连篇累牍的连一个大观园尚记不明瞭。然则《禹贡》的文法，就大比《红楼梦》强的多了。我们于看《红楼梦》外，再看此等的记事文法，文章不更高吗？此外还有好记事文，此时也不及说了。以上随举两端，六经之胜于群籍者已如此，其他无穷的美富，又岂一枝斑管所能尽呀？且经书不但有益文学，六经为我国最古书籍，不读经书，岂能知我国开化的真像？一读经籍，才知古昔盛时，比现在强

得多。且不读经书的人，即寻常之小说，亦看不了。何以故咧？即如《牡丹亭》中之“酒是先生饌，女为君子儒”，如非读过经书的人，焉能知其出于何处咧？举此一端，其余也就可以隅反。可见今日爱读小说的诸君，亦非兼读经书，是不行的了。况经书是中外著名的书籍，如吾人不读，倘若留学外洋的那一天，外国人问你某经共有几卷，某经是谁做的，吾人瞠目而不能答，岂不被人笑么？总而言之，我于此时劝人读经，未必有人肯信我，也不过随便谈谈。等到你们有日寻找经学的时候，那时节我却不轻易告诉你咧。

以上五条，我不过略举大纲。至于中等科的国文教授法，有夏雨仲君所著的《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一书，言之甚详，其言多可采取。此君说了，我也不必再说。《文法要略》、《文字源流》等书，可为中等科文学的补助，稍稍读点，也无妨碍。若讲到高深之文法文理，则此等书籍，尚是不足用的。总之我对于文学上之范围，应自白话文起，读到古经籍止。由极新走到极旧，这是我的主旨。自信此旨尚无偏倚，但不敢必他人之意以为如何。至如此书乃被周刊社诸君催成，文字多有未检，尚祈诸君谅之。

（原载《清华周刊》，总第 186 期，1920 年 4 月 30 日）

校史随笔序

傅增湘*

岁在己巳，上海涵芬楼汇集宋元古本及明槧旧钞，影印《二十四史》，至丙子岁而始迄功，盖自乾隆武英殿勒刊，洎同治五局合刻以来，包举正史而整齐之，竟克奏无前之伟绩。然其间腐心淬掌，始终不懈，以底于成者，实海盐张公菊生一人主力也。自刊印伊始，公即独任校勘之役，每一史刊成，辄缀跋文于后，牖板刻之源流，举文字之同异，与前贤相发明，或为今时之创获，其致力之精能，记问之赅博，海内人士固已披观而服习之矣。间尝语公，书成之后宜仿子晋题跋、堯圃书录之例，取诸跋勒为一编，以饷学者，其校记全稿亟宜刊布，以竟全功。未几，以《校史随笔》来，谓稿本丛繁，董理有待，兹择其领要，录为此编，属为序而行之。

窃惟史籍浩繁，号为难治，近代鸿著，无知王氏《商榷》、钱氏《考异》、赵氏《劄记》三书。三君皆当代硕儒，竭毕生之力以成其书，其考辨精深，征引赅博，足为读史之津寄。然往往于疑误夺失之处，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说，类能推断，以识其乖违，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则以未获多见旧本，无所取证也。第旧本罕传，寻求匪易，钱氏晓征，博极群书，观其《旧唐书考异》，言关内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似闻人论本未尝寓目，明刻如此，遑论宋元！更以近事言之，合州张石卿亦乡里好学之士，侈言欲手校全史，持书遍谒胜流。共和之初，遇于海上，告以勘定古书，宜广征善本，否则徒劳寡益，壮志难偿。石卿不喻斯旨，矻矻廿年，取材之书

*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在天津先后创建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女子师范，此后几年间致力于在直隶地区创办和完善初等师范学校，撰有《改良私塾浅说》，1917年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因拒签罢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命令而辞职，1925年出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31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名誉导师。傅增湘是中国近代大藏书家之一，生平藏书二十万卷，亲手校勘善本约一万六千卷，编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外库书目》。其历年的访书笔记《藏园瞥录》由傅熹年整理，编为《藏园群书经眼录》出版。三十年代在天津《国闻周报》上陆续发表的群书题跋最后整理为《藏园群书题记》出版，另有《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书目》等。

不越殿本、局刊，上至汲古、北监而止。年逾七十于“迁史”始见震泽王氏本。身后以遗稿见托，疏陋无取，实难问世，追惟其事，深可矜哀！可知校勘之事，良未易言，非博求旧本，得所据依，自可循流以溯源，庶免冥途而泛索也。

今观《随笔》所载，凡一百六十四则，视原稿当不及十之一，而博识雅裁，洪纤毕举。凡所疑室，为之疏通而证明；遇有舛讹，得以随文而匡正。至于逸文夺叶，亦皆援据古本，广采旁蒐，以信今而传后。其诣力所到，时与王、钱诸人之说互相阐发，而精审且或过之。盖公所引据，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论定，多千古未发之覆，阅之关开节解，如芟榛棘而履康庄，拨雾翳而披晴昊，其开示后人之功岂细哉！昔王氏著《商榷》成，其自序有言曰：“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今兹编既出，世之读史者咸已受其逸、乐其易矣，岂知其难且劳者固如是哉！

忆创议之初，或疑古刊传世日稀，诸史颇难求备，且卷帙繁浩，沿袭纷纭，造端既闳，杀青匪易。公独奋厉图维，引为己责，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缔交耆硕，遍观馆库，下至列肆冷摊，靡不躬历，闻见所得，籍记于册。海内故家，亦风闻景附，咸出篋藏，助成盛举。于是胪列诸本，拔取殊尤，远者写仿以归，近者投匭见假。而编排之际，端绪至纷。宋刻旧少完编，则遍征残卷；秘籍世不再出，则取资覆刊。一史而同备数刻，必录其先者；无刻而兼取传钞，必采其善者。或合并异刻，乃完一书；或续获精雕，而弃前本。凡此甄择之功，皆再三矜审而始定。举其大较言之：如黄氏《史记》，遍访诸家，卷帙粗完；《三国志》求之海外，二《志》始备；《晋书》、《唐书》皆密行细字，嗣得别本同式，可云巧合；至《旧唐书》宋本取之瞿氏，《宋史》元本得之内阁，号为海内孤籍，此外寸楮不存，一则续以嘉靖闻刻，一则续以成化朱刻，牵补经营，稍弥缺憾；若“薛史”遗编，悬金购求而不得，《周书》宋本，竟罹兵火而顿亡，斯则补救无方，徒增叹悼而已！此成书之难，非尽人能喻者也。

若夫校正之事，浩博无涯，公既取精而用宏，加之实事求是，凡得古刊，取校官本，旁参别刻，广证群书，其纠讹补佚，更仆以难终。聊就兹编，粗举梗概。如校《史记》而知《正义》、《集解》之文遗逸正多；校《汉书》而知刘向所录宋祁之校要可取信；校《晋书》则知卢氏校补率与相符；校《金史》则知钱氏《考异》、施氏《详校》尚多未尽；校《五代史》因知吴氏《纂误》、王氏《商榷》均以未睹宋刊，致生纠摘。根据既定，榛梗悉除。又，诸史阙文，今补《南齐》地志、列传二叶，《宋史》

张栻、田况列传二叶，至《南史》蒯东寅之序，《宋史》朱英之序，《元史》宋濂之后记，弥其缺失，足证遗文，宁非快事！若夫片语单辞，形音易舛，而一字之失，千里遂差。如《南齐纪》“口中出血”辗转误作“舌言”，《梁书纪》儒进土囊谋逆，乃遗王伟罪状，出入关系岂轻！“鵠衣”为隋后采桑之服，令作“鵠服”，皆非；“钩鱼”为辽主游畋之礼，今作“钓鱼”，已失。获此孤证，可存典章。至《魏书》九磬之舞，《北史》锡囊之服，《辽史》汐者之人，取证《周官》。以纠时本。凡此校余之琐语，粹为乙部之菁英，设非通贯群言，钩稽百代，何以臻兹！此校史之劳，匪旦夕可就者也。

嗟夫！文籍显晦，要有数存，盛业克成，亦由人力。当乾隆中叶，才俊蔚起，殿阁修书，宜可垂为定本，而流传迄今，尚多遗议，同治之初，广设书局，而全史重刊，未为精善；留此鸿功，待诸今日。我公乃应运而兴，肩兹鉅任，适会世运日新，禁纲大弛，上而天府之珍储，下而故家之秘库，西至于流沙，东极于蓬岛，地不爱宝，奇书尽出；加以车航凑集，艺术精奇，毫素之用，助以化工，剞劂之劳，易以石墨；此皆前世所未经，而于今为极盛。公得以张其伟力，运以精思，计日程功，昕夕忘倦。中更祸难，茹苦支持，不及十年，而煌煌万叶鉅编，播行于宇内外，所谓天启其心，人基之谋，固无假余之赞扬。今更出其绪余，刊此校笔，如开万宝之库，倒珊瑚之藏，断玉零玕，咸为珍异，洵乙部之总龟，非仅丹铅之别录矣。

顾余窃有感者，自维学殖荒落，垂老无成，只以夙嗜仇书，托交卅载，与公气谊相合，投分遂深。忆始事之初，引共谋议，参订版本，相与访寻，尽出家世藏书，如宋刻则有《史记》、《魏书》、《南齐书》、《唐书》、《五代史》，元刻则有南、北、辽、金四史，虽缺完不一，而罕异为多，乐在观成，未容秘惜。惟自惭疏懒，无以为助，而公乃商讨殷勤，不耻下问，笺札往还，日月不绝。每撰一文，辄千里邮示；遇有疑滞，或时获新解，复举相质正。尝闻印史影本，悉经手勘，至再至三，偶以数卷见投，则朱墨烂然，盈行溢幅，密若点蝇，紫如赤练，文字点画，纤毫不遗，因益知公之坚勤劬苦，度越恒流，能成此不朽之业。故于是书之成也，敢述经始之难，与图成之劳，表公之志事坚勤，以告当世，而余亦借以附名简末，其为幸不既多乎！戊寅十二月十八日，江安傅增湘拜序。

（选自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藏园序跋选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宋代诗学

黄 节*

宋初去晚唐未远,故温、李之风由五季以流入,则西昆体兴焉。西昆体者,晏殊、钱惟演、杨亿、刘筠诸人所创也。亿尝集同时作者凡十七人,刻《西昆酬唱集》,皆温、李一派者。诗取近体,辞务妍华,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捋扯之讥。石介作《怪说》以刺之曰:“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剗镞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盖当时杨、刘先后禁中,倡近体,为天下宗尚者四十年,故介疾之深也。顾兹体浮艳,易流轻佻,其后真宗以《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遂下诏禁文体浮艳,而其风始渐息。要而论之,杨、刘诸人,时际升平,故其为诗,雍容典赡,无唐末五季衰飒之气,此其胜也。然而专工对偶,疏于气格,词华虽丽,六义则缺,此其短也。清初吴之振作《宋诗钞》,遂置亿不录,良有所见。而纪晓岚乃称西昆体取材博赡,炼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未免阿所好矣。西昆之焰既戢,而苏子美、梅圣俞继起,称“苏梅”体。才力体制,尽翻西昆窠臼。梅诗旨趣古淡,有晋宋遗风,当时王曙叹以为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而欧阳修序其诗称:“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又序《子美集》曰:“当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撚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子美独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可见宋初之诗,至苏、梅一变二《刘后村诗话》云:“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是故其时去西昆之风未远,前乎苏、梅者,有王禹偁;欲变之而未能,盖王五师友讲习也(见《叶水心语》)。至

* 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广东顺德人。1929—1932年间任清华中文系教授。黄节是晚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多在南方活动,曾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刊印《风雨楼丛书》,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出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后期投身教育事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黄节是“南社”成员,著名的古体诗人,有诗集《蒹葭楼诗》。他还精于诗学研究,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武帝魏文帝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陶渊明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等。他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诗学》、《诗律》1925年由当时的北大出版部自行排印。

苏、梅稍变之，而和者尚寡，至欧阳修出而尽变之。自欧公以后，宋诗之源流，可得而述，则存乎师友讲习故也。欧公初年与梅圣俞齐名，称“欧梅”。《四库书目提要》论之曰：“宋初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而后人论宋诗辄称“欧苏”，《刘后村诗话》云：“六一、坡公巍然为一家，学者宗焉。”盖在初变之时，则梅为之倡，而欧为之继，梅既先死，而苏为后起，故或称“欧梅”，或称“欧苏”，时不同也。

论欧公之诗，抑有毁誉不齐者，李调元谓欧诗全是有韵古文。王渔洋则谓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公始拔流俗。然李不喜宋诗，其言未足为允。渔洋称欧公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就其所长而言，是则七言古体其最也。《庐山高》一篇，盖欧公所自负，然非其至者，其与梅圣俞往还诸诗独佳（如《圣俞会饮时圣俞赴湖南》、如《镇阳残杏寄圣俞》、如《因马察院至寄圣俞》、如《见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如《尝新茶呈圣俞》、如《寄圣俞》等篇，皆七言长句）。欧公壮年，肆力于诗，中岁以后，则肆力于文。故与梅往还之作，独多亦独佳也。陈后山谓欧公不好杜甫诗，今观欧公《诗话》称杜甫者极少，有则比之王维，或称李、杜豪放而已，惟于昌黎则极称之（《诗话》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人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开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困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予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盖欧公为人，尝以昌黎之后一人自命，其文学昌黎，于诗亦然，其视诗亦等之昌黎所谓余事而已。欧公痛晚唐诗人竞为绮靡，风云草木，填溢篇章，乃于小雪会饮日，创为禁体诗，不得用玉月梅梨絮练白舞鹅鹤等字。其有句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寒窥冥漠”，则其痛绮靡之作可知矣。其后东坡在颖亦举此体，所谓“当时号令君听取，百战不许持寸铁”即指此也。此欧公学诗也。

欧公之后，苏、黄之前，独推王安石。王渔洋亟称其七言长句，要之，荆公古近体皆能之。荆公尝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见《张荆部诗序》）。以故荆公之诗，一致力于杜甫，尝谓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